

#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诗词英译探究

## ——以朱曼华《李清照诗词英译全集》为例

吴若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诗词是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诗词作为文化典籍的一部分，其翻译尤显重要。译诗难，乃是共识；译诗之争虽存，但诗词并非不可译。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以朱曼华《李清照诗词英译全集》为例，探究译诗之难，并以三维转换理论，进一步探讨译诗之法，以期促进中国古典诗词译作在译语生态下的传播与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 诗词翻译；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李清照诗词英译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1.1173

### 一、引言

翻译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纽带，是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有关诗词的翻译，德莱顿如是说，译诗“犹如戴着镣铐在绳索上跳舞”（Dryden 1992:18），可见译诗之难。诗词如何译，大家纷呈，各抒己见。而诗词翻译何难之有，为何难，却少有学者问津。鉴于此，本文以资深翻译家朱曼华编译的《李清照诗词英译全集》为例本，品味宋词之美，赏读译诗之妙，体悟译诗之法。以生态翻译学为视角，探索译诗之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对诗词翻译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旨在弥补对朱先生诗词翻译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旨在为诗词翻译研究添砖加瓦，促进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国门，大放异彩。

###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翻译理论，是在全球生态研究热潮的背景下，由中国著名学者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的，发展至今已二十年有余。该理论将生态学与翻译学结合，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究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胡庚申，2013：110）。该理论范式认为，原语和译语分属于各自的“文本生态系统”，“文本生态系统”下又有不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翻译行为中的译者，应致力于保护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与“和谐”（胡庚申，2013：113）。在“如何译”问题上，生态翻译学理论从“适应”与“选择”的角度出发，认为译者应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从而得出最佳译本，实现译本在译语生态环境下的长久“生存”和“发展”。

### 三、从生态翻译学看译诗之难

中国古典诗词形式严整，声韵整齐，语言凝练，意境深远，读时朗朗上口，细细品味起来，又回味无穷。关于诗词的翻译，译者翻译时不仅需要保持诗歌内容一致，还需保证译作读者审美体验与原作读者一致，综合考虑语言、形式、意象、意境等因素。弗罗斯特认为，“诗歌失之于翻译，诗歌亦失之于阐释”（Frost 2014:331）。梁启超也曾感叹诗歌翻译乃至难之事：“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梁启超 2020:377），由此可见译诗实难。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即文本移植，这一层面而言，翻

译即将一种语言生态系统里的文本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生态系统里。移植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文本的语言生态移植、文化生态移植和交际生态移植，并关注译语生态的“重构”与翻译生态的“重建”（胡庚申，2013：201-203）。诗词翻译，可以看作将诗词从原语生态系统移植到译语生态系统，移植过程中，为达生态平衡，需要“重构”诗词在原语中的生态环境以及“重建”诗词在译语中的翻译生态。而诗词“重构”与“重建”过程中，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显著差异难免造成诗词译作水土不服，这种生态系统差异又具体表现在语言生态差异、文化生态差异以及交际生态差异上。

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看，诗词翻译之所以难，其一是由于原语生态系统与译语生态系统在语言生态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中西语言与诗词艺术形式上的差异。中国诗词语言精练，在诗词形式上，节奏清晰，音韵和谐，含有格律、韵律、平仄、对仗等多种形式。以宋词为例，尽管在形式上打破了唐诗规整的句式结构，但在音律、结构、字数等方面，依旧受词牌的规范约束，有固定的句式押韵。英诗，受语法约束，往往在形式上不能像中国诗词那样规整，大多自由，虽也讲求押韵，但在结构上大都比较灵活。如宋代婉约派代表诗人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朱曼华，2018：260）这一句遵循了词的平仄及词牌对字数的限制，采用叠字法，朗朗上口，七组叠词中三组的韵母都为/i/，不经意间便让读者生出凄冷之感。历来有许多翻译家对此句进行了翻译，如许渊冲将其译为“I feel so sad, so drear / So lonely, without cheer.”朱曼华将其译为“I am to seek, seek, and look for what I think/ I feel cold, lonely, so sad and so tragic/ To be sorrowful, unhappy and lovesick.”两位译者在处理时，尽管兼顾了诗词的内容及韵律，采取了押头韵、押尾韵的方法处理叠词，但可以明显感觉到，原语生态下诗词的形美、协调美在移植过程中丧失了不少，想要在译语中找到与原语语音、内容、形式对等的字词实在不易。因此，语言生态的差异会导致诗词从原语生态向译语生态移植过程中，诗词受到磨损，想要做到诗词特点在翻译过程中毫无损失，是极其困难的。

顺着语言的枝蔓继续探寻摸索，文化生态终将显现。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植根于不同民族文化之中，每种语言必定有只属于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所特有的东西，难以为其他民族所理解。因此，试图实现诗词原语与译语的语言生态“平衡”已实属不易，在此基础上，要达到不同语言间的文化生态“平

衡”，更是难上加难。文化生态差异在诗词翻译中，主要反映在意象的运用与审美体验上。意象，是中国诗词的血脉，是带有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景象，诗人借助意象营造意境、奠定感情基调、抒发情感。这些意象往往独具中国文化内涵，而这无疑会成为诗词“移植”过程中的藩篱，意象“移植”过程中出现的错位、缺失，都会使读者审美体验大有不同。以李清照词中“花”这一意象为例，《如梦令》“误入藕花深处”中的“藕花”，《声声慢》“满地黄花堆积”中的“黄花”，《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中的“花”，虽然都用了“花”这种意象，但不同诗词中却有不同喻指，代表诗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状态。第一首词中的“藕花”喻指词人的美好青春年华，给读者以花与主人公皆以“出水芙蓉”之感。第二处的“黄花”亦指代女词人，诗人历经丧夫之痛，国家动荡后，以“黄花”自喻，悲伤憔悴、孤苦伶仃之感，尽现读者眼前。第三处的“花”遭受风雨，零落成土，词人见此景，不禁悲从中来。由此可见，诗词中的意象，往往是带有主观色彩和思想情感的，诗词穿越千里到异国他乡，其中的意象难免会有缺失、错位，倘若幸运一一对应上了，意象所特有的情感色彩，营造的意境，想要在译语生态中落地生根，也绝非一件易事。此外，中国诗词中特有的文化成分，如地名、人名、节日、习俗、典故等，由于与译语文化生态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成分所所含的文化内涵，很难引发译语生态中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这些都是造成诗词“移植”后难以“适应”译语生态的因素。

诗词从原语生态移植到译语生态的困难又体现在交际生态上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诗词的交际意图能否完整移植，即诗词所表达的情感以及诗词独特的语言形式及文化内涵所营造出诗词神韵能否在译语生态中完整再现。当代翻译界大家王以铸先生曾说：“诗歌的神韵、意境或说得通俗些，它的味道即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有机地溶化在诗人写诗时使用的语言当中，这是无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或方言）来表达的。”（王以铸，1983：192）也就是说，诗词的意境神韵深深植根于原语生态中，移植过程中，原诗的味道神韵能否引发与原语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的确是诗词翻译难点所在。以李清照《如梦令》为例，原文如下：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从内容上看，这首词似乎仅仅记叙了女主人公酒醒之后，围绕雨后院中海棠与侍女的生活对话，但细品起来，这首词又别有一番味道。前两句词人用“昨夜”“卷帘”体现时间变化，借“浓睡”“残酒”又刻画出词人的心理变化，为诗词奠定感情基调，后两句看似问花，实则是借花喻己，借花抒情，整首诗委婉曲折，表达出词人伤春惜春，以花喻己，感慨青春流逝之感。翻译这首诗的过程中，译者倘若只保持原作内容一致，不深刻体悟诗人情感及写作意图，那么译语读者与诗人的共鸣则很难达成。以此首词为例，映射博大精深的中国诗词典籍英译，译者移植过程中，若想既兼顾内容形式又表达词人思想感情、展现诗词神韵，让译语读者对诗词的言内及言外之意皆有审美体验，实在不易。译诗之难，便在于此。

#### 四、从生态翻译学看译诗之法

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单从文本角度来看，翻译即“文本移植”，即将一种语言生态系统里的文本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生态系统中去（胡庚申，2013：201）。文本移植过程中，由于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差异，译者需要“适应”原语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做出“选择”。至于译者如何适应/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要做到“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的适应性转换。下面本文将以朱曼华编译的《李清照诗词英译全集》为例，从生态翻译学的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分析朱曼华在诗词英译中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从而进一步探究三位转换理论对诗词翻译的指导意义。

##### （一）语言维度的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6），体现在诗词翻译上，就是要求译者关注原诗的词汇、句式、语言风格、节奏韵律等，从而适应中西差异，力求实现译作语言最优化。以李清照《如梦令》为例，原文如下：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全诗篇幅不长，却平仄有序，句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短短几句，便将游赏之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结尾戛然而止，给人意犹未尽之感。朱曼华先生将其翻译为：

Like a Dream Verse

I often remember sundown over river pavilion dome,  
Being intoxicated so deeply to lose my back way home.

Full enjoy later, returning on boat,

To take a wrong road where lotuses grow.

Paddle, paddle!

Gulls on a beach suddenly fly in a row.

译者在处理语言差异上可谓下足了功夫，内容上力求一致，将“日暮”处理为“sundown”，“沉醉”取“深深陶醉”之意，译为“being intoxicated so deeply to”，合乎情境。在韵律处理上，前两句押韵脚/m/，后两句押韵脚/əu/，读起来流畅上口，达到诗词韵律效果。原文形式上重复的“争渡，争渡”，译文巧妙使用“paddle, paddle”实现形式对等。译者通过语言维度上的转换，使译作兼顾形式与内容，堪称佳译。

诗词除要求押韵外，有些诗句形式也独具一格。如李清照《乌江》中“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不难看出，该句中的“生”、“死”，“人杰”、“鬼雄”形成对仗，在英译时，朱曼华先生将其处理为“Alive, as a hero I live my life / Dead, as a ghost king I died.”实现了译文在语序及概念上的对仗。译者通过语言维度上的适应性转换，将原诗之妙体现的恰到好处。

##### （二）文化维度的适应性转换

所谓文化维度的转换，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具有“文化意识”，要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胡庚申，2013）。诗词英译时，文化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主要体现在典故、诗词意象以及专有词

汇的处理上。以李清照《乌江》中“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为例，该首诗引用“项羽兵败自刎乌江”作为典故，以此来表达作者崇高气节的精神风貌。中国语境下，“项羽”一词并不陌生，而英译这首诗时，却要考虑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朱曼华先生将此句译为：Still I miss of brave Xiang Yu / Not crossing the East-Riverside. 对于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这一典故，译者采用注释的方法加以说明：As a well-known ancient brave general, Xiang Yu (232BC~202BC) killed himself when he was finally defeated near the Wujiang River. 再如李清照《多丽咏白菊》“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中的“贵妃”“孙寿”都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世人皆知的人物，而考虑到译文读者文化背景，作者将其翻译为“Such white flowers were unlike Yang Guifei's look / Unlike Sunshou's sad brows painted in black”，并对“贵妃”“孙寿”加以注释说明：Yang Guifei: Yang Yuhuan (719~756), the most beautiful concubine of Emperor Li Longji, Tang Dynasty, China; Sunshou: She was a wife of Great General Liang Ji, the East Han Dynasty, China. 生态翻译学认为，“受众需要”和“文化接受”是“生态翻译环境，特别是译语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陶李春、胡庚申，2016）。译者通过加注的方法，既有效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及其形象性，又满足了受众需要，使译文读者体会到其中的文化内涵，易于接受。就这一层面而言，译者通过文化维度的适应性转换，实现了原语生态“多元文化”与译语生态“文化接受”的平衡。

### （三）交际维度的适应性转换

交际维强调译者应在翻译过程中将原语交际意图成功转换到译语之中（胡庚申，2006），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传递语言信息、文化内涵，还需要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能否在译文中再现。以李清照《一剪梅》下阕为例，原文为：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朱曼华先生将其译为：

Flowers drift alone out of the smell,

The creek running alone is natural,

There's one kind of lovesickness,

Coming from two places with sadness.

No way could cure such a sickness,

Just falling down from my eyebrows,

Into my heart with sorrows.

从原词来看，下阕重在抒情，以“花自飘零水自流”承上启下，引入下文词人心情的抒发，尽管词人愁思满绪，花还是会凋落，水还是继续向前流动。“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词人由物及人，联想到自己及丈夫都饱受相思之苦，却“无计”可施，这种相思“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词人直抒胸臆，表达对丈夫深深思念及孤苦无助之感。译者能够将这种词人愁思通过翻译展现出来，在音律方面，采用抑扬格，读起来给读者以舒缓、落寞之感，达到原词凄苦的音韵效果。在内容上，译者在理解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翻译，用“alone”一词修饰“flower drift”及“the creek running”，使译语读者从“花”与“水”的孤单联想到词人的孤单落寞。将

“相思”译为“lovesickness”，“闲愁”译为“sadness”暗示诗人之愁来源于与丈夫的相思之苦，“无计”处理无“no way”，语气强烈，起到一定的强调效果。最后一句“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译者用“just”一词引领，增译“with sorrow”，更直接点明词人对丈夫的深深思念。交际意图的传达，就是为了让译语读者与原作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而不会因为文化的差异对译作产生晦涩陌生之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准确传达诗词信息的同时，照顾原作形式，通过交际维度的适应性转换，传达诗人情感，给译语读者以原诗词相同的审美感受，达到了翻译的效果。

### 五、结语

以东方生态智慧为理论支点和思想依归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二十余载，生机勃勃，方兴未艾。以此理论为视角，本文探讨了诗词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给诗词翻译带来的困难，并以朱曼华先生编译的《李清照诗词英译全集》为例，分析了生态翻译学中“语言维”、“文化维”、“生态维”适应性转换理论对诗词翻译的指导意义。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时既要关注原诗的风格韵律节奏，又要准确传达意象及文化负载词的含义，同时还要兼顾诗词的神韵意境、作者的意图情感以及读者的审美体验等。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时代赋予了译者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作为译者，当砥砺前行，不负重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 参考文献：

- [1] Dryden, J. On translation [A]. In R. Schulte & J.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7-31
-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p 110)
- [3] 田庆芳. 语言的不可译性与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较 [J]. 上海翻译, 2007, (2): 47-51.
- [4] Frost, R. Robert Frost [A]. In E. Knowles (ed.).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30-331.
- [5]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 [M]. 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 (第 11 卷) [C].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 340-388
- [6] 王以铸. 论诗之不可译 ——兼论译诗问题,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 1983, P192
- [7]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3): 49-52.
- [8] 陶李春, 胡庚申. 贯中西、适者存: 生态翻译学的兴起与国际化 ——胡庚申教授访谈录 [J]. 中国外语, 2016 (5).
- [9] 何晓花.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中国古典诗词译介研究 ——以罗郁正汉诗英译为例 [J]. 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6 (3): 52-56.